

中古式之中國經濟

何廉

今日之世界經濟制度與現象，息息相關，變幻莫測；中美雖遙隔重洋，而牽彼一髮，可動此一身，如近來美國提高銀價之聲浪興起，而中國之一般物價遂受其影響，此即所謂世界經濟時代之象徵也。雖然，世界經濟關係之如此，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為有史以來所逐漸演進而成。人類經濟生活之演化，約歷四階段，第一為家庭經濟時代，次之為城市經濟時代，次之為國家經濟時代，又次為世界經濟時代。家庭經濟時代為上古，城市經濟時代為中古，國家經濟時代進及世界經濟時代為現世。惟此種劃分，殊非絕對，蓋在一時代之中，其他時代之經濟生活，常紛然雜陳。即如吾人謂今日為世界經濟時代，證之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亦誠不訛，然同時經濟國家主義之高潮，方有席捲一切之趨勢；而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之國家，城市經濟甚至家庭經濟之生活，尚多存在。即此可知各時代之區別，祇能視某一時代之特徵而定，凡一時代之經濟現象，呈某種特徵者，吾人即名其為某某經濟時代。如家庭經濟之特徵為自給，主要謀一身一家之自足。城市經濟之特

色為地方化，舉凡農工業之生產，商賈之懋遷，資本勞工貨幣信用之供給，工商業之制度，莫不限於地域隨俗而異。就農業言，則規模狹小，資本微薄，技術拙劣，生產短少；而農奴制度之盛行，條田制畝田制之耕作，尤為特徵。就工業言，則資本技術生產，亦與農業相若，而手藝制度之普遍，行會勢力之雄厚，商業範圍之不廣，為其特徵。至國家經濟，則以謀一國之自足為前提，對本國產業，率予保護；而資本勞工信用之供給較廣，貨幣之應用，貿易之範圍亦加大。世界經濟之特色，在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息息相通，無間彼此，至生產範圍之擴大，交通便利之擴充，資本勞工信用供給之膨脹，貿易範圍之世界化等，尤為顯著之現象。按諸上述，以衡今日中國之經濟生活，自多屬中古式，本文目的，即在就此點論之。

先就中國經濟之地方化總括言之。吾國生產消費，多具地方化之徵，一隅豐收，穀賤傷農，而另一隅則飢民遍野；西北皮毛之價格，與津滬相差懸殊；『江津之柑橘，滿坑滿谷，入壘皆是，至代食橘肉而剝橘皮與橘絡者，反

可得工資」。(胡先驥蜀遊雜感見獨立評論七十一期)此
外如浙江紹興之花雕，金華之火腿，江西景德鎮之瓷器，
閩粵之果物，其產銷亦多限於一地。尤可注意者，為各地
度量衡之參差不一。夫度量衡制度，貴能劃一，方能昭公
平信實，吾國初無統一之制度，各地習用器具花樣之多，
差異之鉅，駭人聽聞。濟南一市，所用衡器，除磅秤外，
尚有三斤四兩，三斤五兩，三斤六兩，三斤八兩等四種秤
量。其量度單位，一官畝原等於六千方尺(營造尺)，但
在濟南及他處，一畝亦可等於八千尺至一萬七千五百尺，
幾三倍官畝之面積。又如南京之布尺等於一·二八英尺，
在濟南則等於一·一六尺。南京之木尺等於一·〇九，濟
南則等於一·〇四。漢口一埠，尺有六種，自十一英寸至
十五英寸不等。斗有五種，大小亦各不同。北平一地所用
之尺，長短不同者共有七十餘種之多，最長者較標準尺長
百分之三十，最短者較標準尺短百分之十六。尤有趣之例
，如上海一担重百五十斤，而雲南一担重千二百斤，黑龍
江米一担重三百斤，麥一擔則重六百斤。其他類似情形，
不可勝舉，一國之經濟，非地方化至於極度，曷克致此？

再就中國之農業狀況言之，中國為農業國家，其農業
經濟狀況，宜足以代表全國之經濟程度。中國今日農民佔

全人口之百分之七十五，與英國一七九二年前，德國一八
七一年前之情形相類。較之美國今日之農民僅佔全人口之
百分之二六，法國百分之四二，德國百分之三一，英國百
分之七，俱高出數倍；即較日本之百分之五五，印度之百
分之七二，亦有過之。而已耕之農地，據劉季陶先生最高
之估計，不過為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平均每
一農人之耕種面積，不過為〇·八三英畝。又據金陵大學
皖直豫陝浙閩蘇七省之調查，平均每每家之耕種面積為五英
畝零一，若以每家五口計之，每人所耕，亦不過一英畝
左右。而據作者在山東所調查之結果，農家之耕種面積
，少至一英畝或一英畝以下者，至佔調查家數(三千餘家
)百分之五五。即以金陵大學之調查為準，我國農家之耕
種面積，小於美國者，約十二倍有餘；小於丹麥者，亦六
倍以上。故中國之農業，以人工言，為極端集約 (Inten-
 sive) 之農作。惟就資本額言之，則據金陵大學之調查平
均每農家之資本計一七六九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為不動
產，如土地房屋樹林之類，百分之四為牲口，百分之二為
農具，百分之二為種子及糧食，實際上之情形，自耕農與
佃農之資本，猶相差極鉅。據作者調查山東佃農之資本在
五十元以下者，約佔調查佃農全數(五百餘家)五分之二

。資本如是之微，而牲畜農具所佔部分又如其小，故中國農田耕種之動力，大都爲人力，即畜力亦不多用。據中央研究院一九三二年在徐州之調查，至有三戶共用一牲畜，租用牲畜耕田一畝，須一人工作三日以償之情形，牲畜之少，可以想見。結果所至，每六英畝耕地，需動力一馬力，而每一農家所有之動力，尙不足此數也。尤足痛者爲耕地之破碎，東南邱陵之區，固然如斯，即大河南北之沃野千里者，亦溝塍密布。據中央研究院之調查，無錫三十四家，每家所有耕地咸在十五畝以上，然此十五畝之地，平均分爲十二塊，每塊面積平均爲一·二畝，最小者至於僅有〇·三五畝。據李景漢先生河北定縣一村內二百家一五五二塊田之調查，平均每田面積爲四·二畝，百分之六十九在五畝以下。是直肖歐洲中古邑時代之條田制矣。至中國佃農之佃田完租方法，亦各地異制，田租高低，迥不相同。據江蘇農民協會之調查，崇明吳江縣有所謂「永佃權」，佃戶每畝納租金若干元，卽有永遠承佃之權，田主不另換佃戶，佃戶亦不得退田，此種制度頗與歐洲之農奴制度相類似。

再就工業言之。中國工業，自通商巨埠觀之，似已達相當現代化之程度，蓋因日常所用，耳目所接，大都爲工

廠工業之產物。殊不知手藝工業之生產，實佔全國工業生產之十分之九，手藝工業工人之數目，亦遠過工廠工人。卽就棉紡織業之情形而論，民國十九年全國共銷棉紗九六一兆磅，其中力織機之消費量僅二〇七兆磅，而手織機之消費量竟達七五四兆磅，爲一與四之比，卽此可見手藝工業在今日中國之重要。歐洲之行會，濫觴於十四世紀，其在中國則十二世紀卽已發生，降至今日，依然爲工商界之支配勢力，一九二七年上海一隅卽有工業行會五八個，商幫一一七個，同鄉會館一五一所；廣州一處，由行會與商幫改組成之職工會有四三〇個。此種行會，不特能規定價格，控制市場，且能訂定度量衡制度，與調節一般之經濟生活。卽此又可見行會勢力之依然仍大。卽現代之新式工業，其組織亦多爲合夥組織，恒由親誼關係互相結合，非按公司法設立，故一九三一年之全國註冊公司不過三〇五個，一九三二年不過二〇四個。且股東極少，資本有限，普通一新式工廠之資本額，平均不過爲三五十萬元，營業行事多衡諸情誼，而不講求法效。其僱用之勞工，多季節性，例如上海各工廠每當秋穫之後，僱用工人人數特多，因農隙之時，鄉民赴城覓工，僱用甚易。他如包頭張家口之茶磚廠毛織廠之工人僱傭情形亦如此。勞工與地域之關

保，尙甚密切，亦足徵未脫中古時代之習慣。此類工人，毫無經驗訓練，不能遵守工廠規則；益以目不識丁，知識淺陋，故工作效率極爲低落，殊未能語於西洋之勞工標準也。

再就國際貿易言之。中國國際貿易額，每人平均不過金洋二·九一元，較諸美國之七四·七二元，日本之三〇·四九元，固屬望塵莫及，即較朝鮮之一八·一九元，安南之一一·七三元，蘇俄之五·一九元，亦不可等量齊觀。而即此少量之國際貿易，猶大部份操諸外國洋行與貿易公司之手，國人鮮有自行經營進出口貿易者。國外貿易額如其小之原因，固爲國民生活程度之低落，生產能力之薄弱，然亦由於國內地方貿易額之膨大，此蓋因國民經濟尙停滯於地方自足之局故也。

此外交通之不發達，與此中古式之經濟，殆互爲因果。中國面積大於美國者三分之一，而所有鐵路不過美國之四十分之一，以全國人口四八五兆之衆，僅有鐵路一五·三〇〇公里，平均每百萬人僅三一八公里，而美國則一九二〇年每百萬人平均五，八六一公里，相差一八六倍。況所有鐵路分配極不均勻，全國有鐵路者不過十九省，其中古路五千公里以上者，又不過五省，而以遼寧吉林兩省爲

最多。其他近代航業，多在外人掌握，本國船隻噸數，不過美國百分之二，公路建築，近雖有進展，然亦多供軍用官用耳。內地運輸交通工具，在北方多利用畜力人力，南方則尙有賴於帆舟與肩輿，極肖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狀況，而道路之不修，水利之不興亦似之。

至若金融事業與財政狀況，亦初無二致。新式銀行之興起，雖已有三十年之歷史，頗實際勢力，仍其微弱，至於最近，始稍振作。實際上各重要商埠中執金融事業之牛耳，非爲銀行而爲舊式之錢莊，國內工商界固多與錢莊往來，即外國洋行與銀行，對錢莊之信用，亦恆在銀行之上。而中國錢莊承山西票號之緒餘，究爲舊式金融組織，實未足以應現代經濟之需要，錢莊勢力之存在，正足以表現金融市場之中古色彩耳。幣制紊亂，亦如度量衡制。廢兩改元以前，兩元通用，各銀行在各埠所發紙幣，別埠不能流通；各種銀元重兩成色，每有互差。而各地輔幣之雜亂，紙幣之濫浮，更無庸論。又如政府財政，除直隸中央各省外，餘則多各自爲政，不相統屬，稅收既無定額，徵收復多積弊。軍事供應，一任謀求，每有急需，隨意攤派。中央地方，無適應時代之租稅制度，各級政府，無名實相符之預算。金庫制度，未能厲行，行政官吏，因緣中飽。

前者釐金未廢，直等賦州中古時代之通過稅，今雖裁撤，而各省之由厘金改頭換目者，尙多貌去神存也。

吾國之經濟情形，已拉雜舉例言之。綜上所述，中國今日之一般經濟，實未能脫離中古時代之特點，即通商各埠之新式事業，亦僅虛有其表。探其根本癥結，即在對此中古式之環境，未能加以改變，徒羨他人之現代化制度而強用之，不僅「適滯爲枳」，且根本上即難生長。試舉例言之，近年政府頒布之立法，大率本諸西洋最新之原則，然而國情不同，多成具文。譬如營業稅法，自中央頒布之後，各省即遵照製定營業稅徵收章程，試一展閱，似其完善，而實際各省所徵，其舊有者仍一沿數年前之成例，結果稅法與事實，截然成爲兩事，名易而實不變，於事何補？再就私人事業言，工廠公司之經營，固爲現代之新式組織，當其組織之初，即多未能履行其必須之條件，集股非由公開招收股，東多限於少數人，而身任經理者，又復綜攬一切，公私不分，結果資本數額甚少，而少數人之責任過重，以致企業不易擴充；一遇風波，即往往發生根本動搖

。商業銀行，宜從事於正當之投資，以扶助工商業之發展，始爲正辦。而吾國各商業銀行，因環境上之困難，不易放款，轉而致力於公債之買賣，及地產之經營等投機事業，以期倖獲過度之贏利。諸如此類，足證整個之環境，未能更變，現代化之制度，決不能推行順利；即偶支節用之，亦祇名異而實同。然則改變環境之計將安出？近年政府修電台，修馬路，築公路，辦電氣事業，種種建設，似亦改變環境之方，實則非根本之要圖。處今日而言改革整個環境，不僅在外表之組織與工具，尙須有內心及精神方面之轉變。自政府方面言，宜力求各種制度之現代化與統一，庶能促進國家經濟之實現；宜推廣民衆教育事業，庶能使其思想革新；宜急修各主要之幹路，以爲運輸現代文化之工具。而尤宜減輕農民之過重負擔，使其生機漸蘇，得有接收現代文化之可能。不此之務，則中國經濟之現代化，永難實現。不急之建設，虛浮之改革，無補於事，徒足以滋病民耳。

(完)

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

張茲閣

自從美國擬設法提高銀價的消息傳到中國以來，朝野爲之震動。大家都認爲這是對中國有害無利的。羣衆的心理，與數年前銀價下落所引起恐慌的時候，是整個相反，雖然他們恐慌的程度，是相同的。但是現時討論提高銀價對策的空氣十分緊張，究竟美國已經採取了什麼步驟？是狼值得注意的。按自羅斯福就職以來，最初所採與白銀有關係的方案，便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批准的農業救濟律 (Farm Relief Act)。其中包含有兩段與白銀有關的規定。(一)爲授予大總統有核定銀圓與金圓成分之比率及按此比率無限制鼓鑄金銀圓之全權，(二)爲於本案通過後六個月期內，大總統得接受其他各國對於美國政府負債本息，以銀清償之，其價不得超過每盎司合美幣五角，其數量不得超過美金貳萬萬元。財政部即可如額發行銀幣券，並將所收之銀，鑄成銀幣，以資隨時應付此項銀幣券之兌現。這就是所謂『湯姆士修正案』內容之一部份 (Thomas Amendment)。關於第二項在去年六月裏，美國所收英國戰債一部分，就是這樣交付。但是與現時提高銀價無直接影響。關於第一項，羅斯福并未立時採取實施的步驟，一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批准白銀協定的命令內，才宣佈自該日起，在四年內所有美國造幣廠得接受人民

交來之新出礦的白銀，扣除百分之五十，作爲鑄幣費用；所餘下百分之五十，則鑄成銀幣，交與原主。所可注意的，就是原來銀幣的成分，不會改變。所以除掉所扣百分之五十的鑄費，折合生銀的價格，每盎司約合美幣六角四分五，高出當時市價二角以上。其次若照這樣的規定，事實上等於銀幣可以無限制的鼓鑄。但是只限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出礦的生銀，並不是將現存的生銀，由政府來收買用以鼓鑄銀幣。據我個人所觀察，直至最近，美國方面已經生效的方案，只限於此。但不能十分有效的增加銀價。所以這種方案，對於引起我國銀貨外流的趨向，并無直接的影響。至於最近纔有照市價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收購運至美國償付出口農產價值之白銀，及許政府照市價陸續收買白銀十三萬萬盎司兩議案，現雖已通過衆議院，但都不曾成爲法律。然而銀價因此高漲不少。如果以上兩種新議案，可以通過，又經羅斯福批准，成爲法律，那時銀價很有大漲的可能。但如不成爲事實，照現狀繼續下去，其影響決不會很嚴重。

在原則上，銀在中國是貨幣，銀價上漲，則中國銀元的外匯價值上漲。於是中國貨在世界市價的成本高，而外國貨來中國推銷時成本低，出口於是有減低的趨向，而入

口便有增加的可能。現時大家對於提高銀價，所認為不利於中國的影響，不外乎兩點：（一）外國貨跑到中國，侵佔了國貨的市場，國貨的銷路銳減，則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由此引起金融恐慌，農村更形衰敝。（二）因美國提高銀價，銀貨有外流的趨向，以致國內籌碼不足，於是通貨膨脹（Deflation）的影響，物價因之下落，工商業更形不景氣，引起各種恐慌。這種推論，自然確切不移。凡外匯價值過高的貨幣，如果勞的生產成分不動，一定使生產的負擔增高而處於不利的地位。反之外匯價值過低的貨幣，自然是生產的一層保障，假如在國內的購買力，可以穩定。這種議論，無人能發否認的。但是經濟學的律條，只定相對的可信，而不是絕對可信，因為經濟的動力是時刻變動的。假如我們要想確定上述原則的可信程度，必須要把握整個問題的成因，分析清楚，纔能發得着可靠的結論。許多經濟言論界的先進，都不曾指示給我們，這個問題推演起來，要經過那種階段。這樣去求相當的對策，似乎很不容易，因此引起我以下的各種疑問。

按照國際貿易的原理，從前時代稍遠的經濟學者理論，一國的對外貿易，如果因比較成本高，以致貿易差額顯呈逆勢，其補救方法，首先要由內部整理，將成本減輕。

一面從製造技術及管理上力求效率之增進，一面將工資設法低減。同時并開辦新工業，使勞工及資本均可轉移至較為有利的用途。但是現時勞工及資本，因分工及日趨專門的緣故，其流動性已較前差得多了。再加上勞動組織的阻力，不能使工資減低，所以經濟組合變成固定的。因此許多學者，不去張由勞力一方面來想對策，而由貨幣政策來設法。不過前一說，并不是可以完全推倒的。有些時候，仍然可以適用。現時國內工資很低，無法再減。但是我們國內的工業，在製造上的效率來論，人人都知道是落後。是不是我們的工業家，仍可由這方面去做工夫？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假如尚可從這方面努力，是不是較在貨幣問題設法，更是根本的對策呢？我們參閱上海字林西報二月二十八日所載倫敦金融對於我國銀行界致羅斯福電報的批評，便覺得我這種的懷疑，并不是全無理由。

一國的貨幣外匯價值增高，可以使外國貨來本國推銷時，成本較本國貨低，因而入超增加，國內工業因而不振。但是這種現象，也不是無限制的。仍然要看本國在國際貿易的地位，其入口出口的商品，是什麼性質。換言之，必須看本國國際貿易的伸縮性。本國出口商品的市價，是否受國際物價的支配？入口商品是否有替代物？本國人對

於入口商品的需要，到什麼程度？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以前兩年銀價下落的時候，入口應該減少的，然而并未減少。但是歐戰後的幾年，銀價大漲，入口確曾大增。這個問題，的確難解答。

現在我們很費心思去想提高銀價的對策，自然是針對美國方面而言。但是美國自從在復興程序內，定了許多業規。工作時間是減少了，工資是不減的，工人要多用了。這樣一來，成本的增加，是不能免的。因之價格的增高，也是無法避免。前幾天一個經營美國製造打字機計算機的商人告訴我，他已接到廠家的通知，不久恐怕要將價格提高。這也是意料得到的事實。因此美國貨物因美匯下落，可以增加遠東市場踏路的希望，自然要減少一部份。

其實在國際貿易上，入口出口互為因果。一國之對外購買力，并不以所存金與銀的數額為標準；而仍以出口的數額為比例。出口額增加時，入口往往亦增。入口額增加時，出口亦有增加之可能。至出入口差額不能抵補時（由於本國出品之不良或成本太高，不能得海外市場；或債權國不願接受此種物品之交付），金與銀（用銀國）乃不得不隨之流轉。美國一般人主張提高銀價，以獲得遠東市場之誤解，亦因為不明此種原理之故。所以據我個人觀察，

提高銀價的結果，如果銀貨驟然的巨量外流，決不是因入超驟增的緣故，因為決不見得入口商立刻運銀子到美國去買貨。所以因有形入超的增加，而使銀貨外流，這種情勢是不會立時發生。但是中國多年入超的結果，公私外債累增，而洋商銀行在市面的勢力很大，他們要隨時運現，是大有可能的。所以要想使入口洋貨不致驟然增加來奪國內銷場，決不是阻止銀貨外流，可以得着有效的制裁，并且從貨幣政策着手，所得效力亦是其微的。就事實上的可能來着想，仍以增加關稅為較有效。

所以目前最要顧慮的，便是美國提高銀價，洋商銀行便要運銀赴美。因此存銀日見減少，發生嚴重的貨幣緊縮的影響，物價愈形暴落。所有世界不景氣的負擔，轉移到中國來。我想多數經濟論者，都着重這一點。過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而且難得相當的對策。

在我的意見，以為中國貨幣政策上困難，實因商業上習慣，一切交易，多要用通貨來做交付的手段。因此必須保存大量的通貨。在從前全係銀兩或銀元，現在雖用鈔票，但鈔票的發行，仍需巨量的銀貨做準備。同時我國人窖藏銀子的習慣，至今未除，因之又需要巨量的銀貨，來滿足這種的慾望。而且銀子又是國際上流轉的物品，要受世

界銀價的支配。處這樣情形之下，中國貨幣的管理，必然感覺許多困難，而担负調劑全國金融的銀行界，也要左右補了。

事實上現時貨幣論者，決不是專從通貨上著論。最要緊的還是信用制度。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許多商業行為，都不必用通貨來做交付的手段。如以鈔票的發行，所有手過手的通貨，也不必貴金屬了。在中國現時鈔票的發行既不集中，各行要保存準備數額，較統一發行制總要大些。同時內地又要相當數額的硬幣，來做手過手的通貨。還有窖藏的銀子。所以銀子在中國貨幣上的需要，未免太大了。假如我們可以減少銀子在這方面的需要，便可以騰出多餘的銀子，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不致發生緊縮的惡影響。原來貴金屬在貨幣上的特能，除却一般貨幣學教科書所列舉能耐久及可以分合等性質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使貨幣的發行，有一個限制，然後他的貨值，可以保持。假如我們能用旁的方法，來保證這種數額的限制，貨幣的價值，仍可存在的。美國的貨幣制度，就是一個明證。

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要政治上的安穩，不致發生戰爭及革命等意外事故，使經濟的秩序可以保持等條件外，

最重要的便是要改善銀行制度。鈔票的發行應該及時統一。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即使我國因商業上用票據的習慣，一時提倡不起來，因而信用制度，不能充分發達。然而紙幣的發行，一經統一，使中央銀行有權發行巨量的保證發行額 (Fiduciary Issue)，一方既標明限制，一方慎重發行，務與商業的需要相呼應，不使他變成政府填虧空的手段。於是銀子的需要，自然減少了。所騰得出的銀子，便可用來應付國外的壓力，而不發生緊縮的影響。若照現時情形，有發行權的銀行，平日各自為政，一旦遇有銀貨外流時危機，又各自為戰，自然更難應付了。

最近有人認為中國銀元，一經銀貨外流，被迫而禁銀出口，便成了管理的貨幣。尚有人認為要應付現時的危機，非用管理的貨幣不可，但對管理的貨幣，又不說明，所以更使人難以明瞭。其實管理的貨幣，本來很難下一定義。如果大家認為應照凱恩斯 (J. M. Keynes)，所說的辦法，在中國這種散漫的銀行制度，不知從那裏下手？短期資金的市場（如同倫敦的承兌市場，及紐約的証券抵押借款的市場）既不成立。中央銀行的貼現率，亦并無之，何況論到貼現率的有效無効呢？所以大家假如要採取管理的貨幣，亦非從銀行制度上設法不可。

自然我們要管理貨幣，尚可從其他方面着想。顧季高

先生所主張，出賣我們的存銀，來買外匯，是很有道理的。在英美現時所設立的平準基金，都是國庫的負擔。我們政府暫時沒有這種力量，他提議由發行銀行來經營，尤見匠心。但是我認為仍要改善銀行制度之後着手，尤易生效。因集中發行之後，應得出存銀來經營，便可不影響發行的準備。購入外匯并不一定賺錢，或者是賠錢的。如果由中央銀行來經營，便不致因此影響商業銀行的本身地位。至於改金本位一層，因金銀比率一變為金賤銀貴，理論上金子流入是有可能性的。但我認為這種擬議，也應該在購集金子到相當地位，才談得到。斷不能在現在金子還未到

手，便談到改金本位。尤其是現時美國議提高銀價，却未明顯的採取複本位，對於用金兌現，更毫無這種可能的表現（參閱一月三十日的金準備法案）。大家對於金貨仍不放手，我們也得不着金貨。要改金本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至於銀出口稅及禁銀出口，都是一種臨時應付緊急事機的手段，并不是永久的辦法。如果此時國內銀行制度依然散漫，銀貨外流太驟，措手不及，也只只好採取這種手段了。但是試觀美國的幣史，每逢一次恐慌，即想法將制度改善一次，斷斷不是把臨時策略想出來，便不再去理他的。

答擁護無為政治的主張者

弘伯

僑居異域，去年七月方得讀五月初適之先生那篇『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一文。當時寫了一點東西，叫做『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寄回發表，已經是九月的中下旬了。緣於道遠課忙，初念本是不想寫的。嗣以返觀吾國過去的史實與夫現代的環境，覺得不能默爾而息。我是從適之先生弄過幾年哲學的人，也許還能約略了解他思想的來歷。對於他的憤慨，我表深厚的同情（

證據見前文）；對於他這個主張的影響，却有點擔憂。本於『吾愛吾師，吾却愛真理』之旨，所以大胆針對那文的主腦——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提倡一種無為的政治哲學——發言，証明這種哲學用不着再提倡。理由是：歷史所昭示的效果不良，且為當今的國際形勢所不許。中國的文化，表面上雖是儒家居於首席，實際上却中道家的流毒很深。我們與西洋相較，已經够無爲了，並且還正在受祖傳無爲

政治哲學的罪。所以不宜覆轍復蹈，不宜消極後退，只宜積極努力向前——認真建設。

遲至昨夜，在新到的一包評論內，終發現區少幹先生的『無為與有為』一篇駁議（七十六號）。這是遙遠的一個回響，也可說是空谷的足音，令人高興。他說：『我是擁護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人』。又說：『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為政治的撫乳培養不可』。就從這兩句話中（其他還有：尤其是立塲），也足見適之先生的那文，在思想上已生影響了；也足證我認爲無為政治哲學的勢力早已深入人心的那個看法，大致不差。昔人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社會，一民族，如是我聞，似乎真有其的成訓與『共通意識』啊！要改變，頗不容易（這是德法許多社會學家的說法）。但無論易與難，無論所言是否有當，爲關心黃人的前途起見，我那篇東西，現已証明確有寫的必要的。老實說，憂時的衷懷，個人是有的；至於見解究竟對不對，願國人共同商討。總期求得一個客觀的，平正的，比較妥善的結論，纔好。因爲這問題不但關係國家的存亡，且影響將來整個民族的存滅。『思想爲事實之母』；『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願國人幸勿忽視這問題的重大性。

區先生的文章，和適之先生的那篇一樣，似乎最大的一個缺憾是：看時勢只看了國內的人才與經濟，只說了國內環境如何如何不足以有爲，但對於關係更重大的國際環境，却一字不提。很奇怪！難道中國還可以閉關自守，儼成世外桃源嗎？難道中國現在的四周，還和明代以前，甚至和漢代以前一樣嗎？小環境是逃不了大環境影響的。難道中國的國內政治，可不受國際政治的鞭策麼？縱然我們情願深溝高壘，關起大門來講無爲而治，不慌不忙地再等他幾十年，以來經歷這一段撫乳培養的歷程，然後從事建設，但事實上請問辦得到嗎？天演公例告訴我們：弱肉則強食。請看當今是什麼世界！你要無爲，別人偏要來和你有爲了；你要閉戶，別人偏要登龍求見了。這登龍在起初還是斯斯文文地『重譯來朝』，在後便毫不客氣地動脚動手了。歷史的教訓如此，將來則更嚴重。一九三六年的危機，目下國際間的形勢，不知區先生也會注意過麼？『放開眼睛看過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固然很對，但是還須得再看遠一點呀！不然；恐有夜半深池之憂。萬一嘩啦一聲，那時便悔之晚矣！

區先生以爲我遠在異邦，只看慣了西歐的瓊樓玉宇而絕對忽略了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對此首先有點聲辨。

個人是抵敵不久的，去國前曾深入內地去看過農村實在痛苦的情形。我的家就在鄉間，且世以耕讀爲業。到內地旅行的時間不算很短，綜算起來，有半年多。在鄉下住的日子也不少，整整有兩個月。我是極不滿意於現狀者，我是極痛心於軍閥官僚的治績者，我也是極表同情於平民者，因爲我本身，就是平民。平民的痛苦絕對當解救，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如何解救的方法。

在未提方法以前，我們須先認明一宗事實。譬如醫，要投方劑，必須先診清病源。否則必誤下歧黃；事與願違，不惟效驗不生，甚至斷送他人的老命。

我們第一要問：現在的民不聊生，是否真是且全是由於建設？是否一切的建設停止了，人民就可以昭蘇？區先生舉出廣東停止築路的事例，據說原因是：『馬路兩傍的人民，即使勉強有錢交給路費，却再不能勉強弄錢建築自己的舖屋。結果是：當中一條好好的馬路，繞着兩傍拆得七零八落破敗不堪的爛屋』。是的，爲修路而拆爛民房，誠爲病擾。但我們要問：這爛屋的不能復葺，真是且全是由於路捐一項之過嗎？倘然是，則停止開築的明令已下了，好了沒有？昭蘇的機會已得，試問豁然沒有？如答案是肯定的，自不用說；若猶未也，則或另有更重大的原因在

。墨子云：『辨也者，有不見也』。不知區先生曾經注意沒有，原文中我有下列幾句：

內部的人力與財力，適之先生認爲遠不足以有爲，所以頂好不要高談建設。假如不度德不量力，便是叫化子沒飯吃而妄想建造瓊樓玉宇，便是絕倫的謬妄。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收入，大部份是用於軍費，其次是政費，用於建設者寥寥。就在寥寥的建設費中，真正用來作實事者，尤屬寥寥。這可見財力問題的癥結並不是一文不名的赤貧，乃是尙有幾文而用不得其當。害人的不是建設本身，乃是不善辨理建設的官僚和攘奪建費的丘八。依我們的意見，消極救濟農村的辦法，只是裁兵與裁官，不是停止建設。因爲在全體比例上，建費實微乎其微。即使全部取消了，於農民的負擔也輕不了多少。況且名符其實的建設，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生產的，不光是消費的；是救民救國所必需的，不是光做樣子出來好看的。所以，如果有朝有日，附庸能蔚爲大國——建費與軍政費易地而居——則中華民國之在世界，也或者就有抬頭的希望了。（獨

評這裏應當覆按的是吾國財政收支的統計，因為牠是討論本題的基礎。在前我曾經過一下，民八預算歲入實際總數為四億餘（歲入經常臨時共計，本為六四七，六九一，

七八七元。內除國內公債，銀行借款，及無確實增加收數之警察收入三款外，故實際僅四億餘）。在支出方面，單是軍費一項，便占二億五千餘萬，居全收入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據第一回中國年鑑，第四一三頁，商務本。這是此間所能得的材料）。原書續云：『民八以後，國事日紛，財政益紊，正式預算，無從稽考』。故以後若干年均付闕如，是誠憾事。但吾國軍額，不惟未減，且與年俱增，這是共曉的事實。吾國常備兵額，冠於全球，這也是共曉的事實。因此，我乃據常識判斷：『中國的收入，大部份用於軍費，……用於建設者寥寥』。我相信：這個判斷是不會大錯的。區先生是近水樓臺，比我易於搜查這方面的資料。為明瞭真象起見，極盼能找得確切新鮮的數目字，證明無論是中央，是地方，支出方面，不是大部份用於軍費，也不是其次是政費，乃是我所希望的建設費。並且再請附帶調查，證明在建設方面，確已涓滴歸公，真作實事，未飽私囊（據個人前在川的調查，狼慚愧。也許外間好點）

。如果區先生將來的答案是『正』，則我決即撤銷前論，欣慰無似。否則我似乎不能不相信：『害人的不是建設本身，乃是不善辦理建設的官僚和攘奪建費的丘八』。

認清這事實以後，我們可以提解救的方法了。這方法比較上可分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消極的是適之先生的主張，具體的辦法如裁兵裁官省事（停止一切建設）。積極的是個人的意見，具體的辦法如改良農產，改進農業技術，便利運輸，濬河造林，興辦實業，屯墾邊殖，一言以蔽之曰：認真建設。用吾國的老話來講，前者近於節流，後者屬於開源。節流雖可暫時鬆口氣，但問題仍然存在。不信嗎？請查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最近見大公報載：『據國際貿易局呈報實業部，二十二年對外貿易，入超達九萬萬左右。這個驚人的數字，代表洪水猛獸般的國外商品流入中國來。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一大動力』。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與三千年來一治一亂的背景，便可了然。近於節流的政策雖非完全不妥，但只有裁官裁兵不夠，以停止一切建設為省事則不可。為什麼不可呢？處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要解決問題，應該相信人類由努力得來的智慧，應該設法控制社會與自然，應該勇猛奮鬥向前，應該不怕困難與失敗，應該學學西方

。換言之，即不要因循，不要苟安，不許再照抄有弊的老哲學。

我們無爲的老哲學，和西方有爲的新思想，大體是對立的。真正儒家的意見，和基本的道家哲學，大體也是對立的。（例證見前文）區先生說：『無爲與有爲，只是一個先後的程序問題，並不是兩個對立的體系』。對此我們要問：真的麼？果然是這樣的單簡麼？茲分兩方面來說：

(一) 抽象地講，有爲與無爲，是絕對的對立，毫無疑義；

(二) 具體地說，則主張有爲與無爲者，是相對的對立，也不成問題。

前者在字面上可以答覆區先生，後者在內容上可以使我們，『深切清認』。爲什麼呢？因爲儒家把『有爲』放在前，道家擱在後；反之，道家把『無爲』放在前，儒家擱在後。分野清楚，立場各異。這是見兩派的思想，是相對的對立了，是兩個對立的體系了，并不只是一個程序的問題而非兩個對峙的體系了。我最不贊成的是那個『只』字。如今拿現實的材料來講，比起翻開老賬，或更親切有味：

我們展讀兩文，明明看見：無論適之先生也好，是區

先生也能，都把無爲放在前，有爲擱在後。他們以爲要達富強的境地，必須經過一段無爲的歷程，必須先『做了無爲之爲』，然後可以做有爲之爲。』請問：這還是先有爲然後無爲嗎？這還是必先有禮樂刑政，然後可以垂拱而治嗎？禮樂刑政這些怪麻煩的事物，喜歡省事的家是厭惡的，鄙視的，不要的；在儒家却認爲必不可少。如果區先生說這禮樂刑政等等，就是他的所謂『無爲之爲』，恐怕真正的道家要擺腦袋吧？如果區先生說這個『有爲』就是他的所謂『無爲之爲』，那麼，則他的話是說：『我們先做了『有爲』，然後可以做『有爲之爲』』了，這不是有點滑稽麼？不過這還是理論上的研討，不甚緊要。現在我們須看看目前的局勢，請問事實上停止一切建設，是否真該？是否可能？再查歷史上文景的富庶，也是否真是無爲在前？我不想再饒舌了，只引第三者吳秀峯君的幾句話來看看：

胡先生謂曹參主張無爲而治，漢室繼隆。不知參乃蕭何政治之實行家，而蕭何乃有爲之國相。參亦承認其與高帝『定天下，法令既明。』是參實非真正無爲的宰相，因當時漢室治國已有規模，故遵而行之，可使國家富強。我國今日，則百端待舉，事

事落後。若不急圖建設，恐時不我與，瞬息日本將代我行之，而國亡矣！……（十一月四日）

大概這也是犯了「忽略有為政治成功所必需經過的一個階級」？大概他是「誤解了無為兩字哲學上的意義」了。適之先生關於無為二字的解釋（區先生稱為定義，不妥），個人並未嘗忽略。我曾經說：「現在受環境的鞭策，須本於無為的精華，『與時推移，因物變化』，不可膠柱鼓瑟，一味模仿從前」。韓非是受老子的影響者（參考適之先生哲史三七三，三七九頁，又史遷老韓列傳末），他頗能認識無為哲學精義。因此我又曾引韓非的話道：「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後人誤解老子，個人還特別聲明，說不是適之先生。這幾點請說我沒有認清無為的定義（？）的區先生留意。

道家的第二位祖師莊子道：「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削斗折衡，而民不爭。」老子自己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再查小國寡民全章），適之先生更具體更摩登的說法是：「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換言之，即讓他維持治安使罷。這可見無為哲學的政治，方向是傾於消極的；適之先生也曾請別人不要笑他的主張太消極。現在區先生狠妙，把我替被裁的兵官想出路，如

與辦實業，屯墾殖邊之類，也一概歸於無為政治範圍之內。請問：這與辦，這屯殖，還是只當警察，什麼事也不要管，一切聽人民自己去辦嗎？這還是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再損嗎？還有，區先生說適之先生在論文附記承認赤區土地的分配，也是無為政策之一。誠然，但這是「不為物先」，是「戔而後往」，而不是像西方人的自動，實驗，發明，創造，冒險，硬要做個樣子出來與人看看啊！注意！這積極與消極是兩條方向不同的路，請國人自加選擇。由西方的那條，事實告訴我們：是民安物阜，是健康愉快。用我們自己的老法子，經驗告訴我們：是災荒貧病，是禍亂憂愁。國人，請看一看，想一想，比較一比較！

四川自流井的馬路，區先生舉出來以作病民擾民的例證。這個極小的例算注意了，其他更以十倍百倍的火餉，附加，預徵，指名勒索，窩捐懶捐客燈照……得毋與新未見？昔有人打趣適之先生的五鬼禍國道：「捉住了五個小鬼，放掉了一個大妖精。如今區先生所放掉的大妖精，似乎還不只一個兩個哩！聲明，我決不是說馬路永遠該那麼修，我是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此善於彼。你以為路捐可以真免嗎？很難。所說的那『翻新花樣，另起名目，以來生財之道，』這是事實問題，並非捏造。區先生引我的話，

止於『雛形的建設，可以作爲改良進步基礎的建設，連這點也沒有。』下文更重要的——『我倒不是滿意於他現在的成績，我是說：出馬路捐比出救國捐。至少還好一絲一釐，害人最凶的是別有用途的預徵，是火餉，是……不是建設費。』——不幸略而未錄。倘讀者未覽原文，恐不免於愾意稍有誤會。假如建設本身真是害人，則東省近兩年，當已民無唯類矣（蘇俄更該江河日下）！如果修馬路便要命，則齊魯當早已蕩無炊煙矣！（據北平社會調查所編的『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交通組第六幅，山東於一九三〇便已有汽車公路九千四百里左右，居第一位；廣東次之，只七千三百里左右）。然而事實呢？這問題請區先生自己去調查，解答。（此下刪去兩長段。——編者）

以上差不多把區先生的駁議答完了，再總結幾句。無爲的政治，若實施於停止一切建設，依個人的意見，以爲有危險，且無需。區先生急於想替人民鬆口氣的心情可佩，但方法則須另商。我決不是不贊成『貧兒撙節儲蓄』我是要大家找得真可以救民救國的有效方法。有衣食然後有

禮義，這話對平民是不錯的。但我們的問題是要如何纔有衣食？是要查出此前沒有衣食的主因。要有衣食；尤其是要有如西方的豐衣食，依我看，決非消極停止一切建設的省事所能生效。必須積極運用科學，認真建設。建設認真了，則。斃去而利來。例如交通便了，則農產品不至有的地方太多，不值錢；有的地太少，價太貴。至於所見深淺的問題，除待第三者評判外，我現在只想說一件故事以淺趣。昔日崔東壁以衛道尊經之故，曾批評宥坐篇的首段道：

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輩人之道則淺矣！

據後人詳加考證，發現東壁微嫌主觀（查張昌圻沫泗考信錄評誤第一七至二二頁商務本）。區先生，你是不是因愛護胡先生而步『二十年來一個了不得疑古大家』的後塵呢？這是一點餘興。

二十三，一，二十八，里昂。

擁護建設

薛典曾

適之先生：這次在獨立評論第八十九期，看見先生發表「再論無爲的政治」的言論，我斗胆的以素昧平生的人，同先生討論一下子。

關於第一段，先生表示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而以爲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先生貢獻政府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我敢說先生未曾把許多的事實，收集起來，而僅就理想中造出的。我並無意爲中國政治贊美，中國的政治弊和害，實在很多，但是將這種弊和害，我們能够一掃而空嗎？教育家如先生，不難悉其中緣由，而不得不承認此種弊和害，決非一時所能去除的。但是因爲我們現在要提倡除弊和害，把積極的救濟，難道就停止嗎？我請把積極的救濟的實例，報告先生，可以做做參攷。從前中國大量輸出品，以絲茶爲最要，農人的生活，倚賴此的，不知多少。後來爲什麼輸出量慘跌呢？就是商人在那裏作偽，把信用失去，所以如此。這件事情，可不是政府作的孽。我們不能把什麼事，多推在政府身上，就同先生素來的主張，不把一切中國的受害，推在洋鬼子身上一樣。現在有商品檢驗局，在那裏檢查出品，當然我不知道那局裏用多少錢；這錢是否從

農人身上直接和間接徵收來的，我不知道；至於這項費用，對農民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害處，我也無從確定。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像茶及其他出品，質地上確已有了標準，信用上確已提高，對於農民的利益，的確不能說少。雖然現在的貿易，因爲受他國的競爭，和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無從恢復以前的輸出量，但是我們也許感想到，如其這種檢驗局早些設立，中國商品的信用，不致墮落，也可以減少他人分肥的念頭。還有一個實例，就是江北一帶，窮苦異常，張季直先生，他從前的主張，要使得數十萬人有豐衣足食的機會，非導淮不可。但是當地的農民，聽說要把他們的地開成河，他們竟暴動起來，結果導淮沒有成功，那數十萬人仍就窮不可言。而且前三年的大水災，如其淮河導成，也許不致把無數的房屋沖去。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未必可以說「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至於從前他在南通興辦市政的時候，他要築馬路，築江鏡，築江堤，開壩等等，有許多次農民捧着香跪在地上求。畢竟他是本地的狀元，狀元是天上星宿下凡，他的意旨，農民可以求教，但是不能違背，結果他要做的事，逐漸實行起來，所以號稱釜底的南通，那次大水災，竟沒受害。這又是一個佐證，我們未必可以說「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

我敢說先生所定的原則，並不正確。至於「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的話，我請把先生所舉的四項實例討論一下，第一項裁減官吏與機關。有很多的官吏和機關，是應該裁減，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要說「受惠者無窮」的話，多少要有數字才能證明（無窮兩字可惜基本上就不能認為數字）。第一我們必需知道每年行政費，約為若干，借政治力量而另取於民的約計若干，現在官吏和機關，約可減去若干，每年可省若干，每農民可減少負擔若干，那麼就民受惠的程度，多少可以確定。我這項意見，不過要指出「無窮」兩字，未免誇張，至於應該裁減官吏和機關，無論對於人民（不能專講農民）利益多少，總應該實行的。

第二項先生主張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這實在是荒謬的。在現在大家提倡建設的時候，而先生忽然主張停止，這足以使人「駭怪」是無可疑的。我以為先生沒有把實事詳細研究，而為「立異」的心理所影響。先生在第四頁中，引何君的話，說是「田賦附加與新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差不多每一附加都有一項新政做背景。新政的名目很多，如教育，公安，自治，清丈……等」。先生把建設叫做新政，而以新政的舉例為教育等，這是萬分牽強的話。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建設」兩字，是辦電廠，築馬

路，造橋樑等等的事，至於教育，公安，自治等，一般人是不認為建設的，簡單的舉例，如其教育上發生學潮問題，地方上發生盜匪的事，或是每縣要辦一種自治的機關，總不會有人去到建設委員會去說話的。如其先生真確的主張農民的負擔，應當多多的減少，或竟是免除，以先生贊同何君的話，以為教育是新政，新政即是無政，無政即係增加農民負擔，那麼先生願否鮮明的主張取消教育，或是取消一部分？我也不敢說公安局，總是能盡職守，但是如其把所有的公安局裁撤，鎗械一齊收回，先生以為地方上的治安，能不受影響嗎？

我並不是說現在的地方行政，是完善的，是無可裁撤的。但是把一切的事業，都目之為「新政」，而更奇怪的又稱曰「建設」，那不得不視為謬見。按先生所引何君的辦法，說是「地方新政，得減便減。不能減時，中央應與以補助。」更按何君所著的「論田賦附加」（在獨立評論八十九號）又說：「如果中央政府無款可助，他應當裁汰冗兵，節省糜費。如果冗兵裁無可裁，中央政府應當裁併驛枝機關，減低官吏俸給，以移出經費。如果俸給移無可移，雖另創新稅亦所不惜。」我們狠可惜何君未曾把新稅的辦法說出來，如其何君能創一種新稅，既不害農，又不

害工商，又不是遺產稅及所得稅等，因為何君以為這是增加市民負擔的。我想任何世界財政家，都恐怕無此本領，惟有夏得海其人，請他做財政部長，到水晶宮去和海龍王敖廣去商量，才有辦法。

先生又指出拆城造馬路，是建設狂熱，因為現在如南昌地方，又趕着造起城來，以禦匪亂。這一點我們應該怪推背圖說得沒有明瞭，他們拆城的時候，原是圖交通的利便，未曾想到共產爺爺，會這樣的厲害。如其先生以為公路不應造，那也許過了幾年，有什麼碧眼睛高鼻子的人，發明了土遁，（我們那時再可誇口我們早就有土行孫可以如此如此的，）我們豈不省去力量建築公路，又未曾害農分寸。或者因為在地下來去，做了蚯蚓的工作，有益於農，也未可知。先生以為南昌拆城造城，就斷然說建設應當廢止，殊不知有狠多城拆去之後，已經築好馬路，交通較前便利。實在的情形，是狠多的城，範圍狠小，市民大多數還在城外。假設城是有用的，也不過保護了少數的市民。至於我們的農民，又當如何呢？我並不是說農民不能保護，連市民也無須保護的意思。如其我們多築公路，如鄉鎮有匪，即可派兵往勦，豈不較為合理？現在江西等地動匪勝利，可以不歸功於公路嗎？至於先生又舉出安徽

北部的汽車路，如何侵佔民田，如何不能通行，這是狠扼腕的事。但是先生應曉得並非所有公路，皆係如此。先生對於貴省的公路，既不滿意，如何僅望望然去之，何不研究此項公路，是否確有用？如屬有用，能否設法修理？這不是較為合理的事嗎？

我記得先生有一次在美國，和一位美國教授同乘汽車，而極力稱頌開汽車如何的有意思。那時我聽見這消息，就狠懷疑，中國不是也有馬路嗎？中國不是也有汽車嗚嗚的開來開去嗎？先生的教授朋友當中，想不乏有能開汽車的，先生也許同乘過，而先生獨在美國時，大獻頌辭，本就費解。當然先生能够游歷美國，領略彼那坐汽車的風味，但是倒響的一般中國人，如連倒響的公路也沒有，倒響的汽車也沒有，豈不是先生所領略的風味，絕對的不能得其一二了嗎？我並不是說中國造公路，就是因為要坐汽車去玩，先生在馬路上，可以留心去看，除去了紅紅綠綠的汽車，其內坐的是少爺小姐們，去參觀作樂外，也有貨車，也有運農產物的車子。

至如我們認為是建設的事，不妨略舉一二，和先生談談。第一是長江的大車輪渡，下次先生從北平到上海來演說的時候，先生也許可以感覺到免去向來候渡的麻煩。又

譬如現在在上海附近真如的地方，新建了無線電台，能夠同倫敦直接通電，先生將來有什麼要事，和倫敦的朋友接洽，那時先生也許可以感覺到迅速的可喜。又譬如先生的大作，在杭州發表，從前的時候，需要數日後，徽州的朋友，才可以看到，現在先生所痛恨的公路造成，僅需一日，先生的宏論，就可滿佈全城，那時先生也許引以為快。

第三項先生主張努力裁兵這同第四項減輕捐稅是有相連關係的。先生以為政府應該切實計畫裁兵的逐漸實行，財政方有出路，國家方有辦法。又批評政府領袖對全國宣言兩大政策，一是完成剿匪工作，一是以建設求統一，視為等於空談。這可說是先生有哲學的思想，而缺乏政治的常識。裁兵當然是要務，政府未必不曉得。如其先生不健忘的時候，也許可以記得政府曾經召集裁兵會議，然而長官不聽話，一場希望，仍歸泡影。先生以為「中央若以裁兵號召全國，全國不應該沒有有力的響應。」誠然響應是有的，然而響應力量足以制服軍閥，先生有把握嗎？如其在政府由先生組織，先生有辦法嗎？進一步說，我敢告訴先生，現政府並不是和先生同一的沒辦法，現政府也未

必就把裁兵大計，完全忘却。在現在還有割據的局面之下，我們能够裁兵嗎？這是絕對不能的。裁兵必然在統一之後，統一必然借重建設，要建設必需先把匪患蕩平。匪患是有把握可以蕩平的，建設是可以着手的，而且在此憂患之時，已經有相當的成績，建設工作如能逐漸完成，統一自有希望，統一之後，政令屬中央，則裁兵自可實現，而財政自有辦法，而國家自有辦法，這種理論，豈不較先生強健多嗎？先生「以為政府應該切實計畫裁兵的逐漸的實行」。汪先生或蔣先生在其電上不是已經表明裁兵的切實計劃嗎？實際的政治家，他無疑的把他第一步的工作，昭告國人，而求得國人的贊助，他決不會把第二步工作，先說出來，也許可以得到國人的贊助，但這種贊助，無濟於事，並不是政治家所要的。

我以為先生這次言論，是忿激之辭，我個人是贊成建設的，認為現在的建設或為「物後」，却非「物先」，希望先生可以給我的言論，一種考慮的榮幸。

薛典會上

三月十四日

☆

☆

☆

☆

☆

☆

擁護無爲

二二

瘦吟

適之先生：

在獨立評論上先后讀到您關於論無爲的政治兩篇文章，暨其他討論此問題的文字，真是感慨無既！我們工務人員提起筆來真是沒有自由，所以七八年來，起因於所謂建設，使老百姓累得喘不過氣，耳聞目見的事實，以及統計上的材料（如各種附捐名額）雖俯拾即是，却也懶得去做成一篇有系統的文字。對於先生其他論政的文字恕我無禮，有時憤慨之極，不免會說：「政論一類的文字胡適之最不好不做！」然而關於論這「好像消極的大政策」——無爲政治，却非常表同情。誠如區少幹君所說：「現時復興各地農村，最要緊的是給他們一個翻蘇的機會；最低限度使他們能夠繼續呼吸，才可以繼續工作。」憑我們的良心，及仔細觀察之結果，可以大膽說一句：這個原則，雖有聖者與，無以易也。

寫這信的本意，是想供給先生關於此問題一點有價

值的材料。

事情是這樣：去年冬間江西省民政廳長朱懷冰先生，曾出巡贛江沿岸各縣，十二月八日以巡視所得三事，電呈南昌行營蔣委員長鑒察。茲照錄其原電第三項全文如後：

（三）匪患連年，民物凋敝至極；各種建設繁興，派捐征夫材料急如星火；人民之負擔奇重，痛苦萬狀，職所到之處，民衆輒擱途請願豁免；而一衝其事項，又爲功令所應辦者。若言其負擔，實心不忍！應請置不急之務，即急要者亦分期舉辦，以恤民艱，而紓民困！

我們看了這段短短的文字，又想想老百姓們擱途請願的神色，感到在目前時勢之下，無爲政治實有提倡之必要。

瘦吟 三月三日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這一期差不多成了「討論無為政治」的專號了。何廉先生本來要為獨立寫一篇「浙江建設的成績與胡適先生的無為主義」，但他臨時收到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信，知道浙江建設的調查報告不日即可印出，所以他換了一個題目，寄了一篇「中古式之中國經濟」來。他在篇末也談到現代化的建設的問題。他這篇文章也是討論建設與無為的一篇基本資料。

△「弘伯」即是前幾次投稿署名「閔仁」的。他現在里昂大學。

△薛典會先生從南京寄信來反對無為之說，擁護一切新建設。而「瘦吟」先生從南昌寄信來反對建設，擁護無為政治。

△「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的作者張益闡先生是南開大學畢業的，曾在美國專研究金融與國際投資，現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會計部服務。（關於銀價問題，讀者請參看獨立九二期何廉先生的長文。）

△本期因有時間性的稿件過多，汪敬熙先生的科學問題再停一期。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二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朝鮮、台灣、日本及租借地	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澳門	每月一元
南洋、緬甸、暹羅、海峽殖民地	每月一元
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南美洲	每月一元四角

商務印書館影印

初集 四庫全書珍本

敝館借印四庫全書之議，倡於十數年前，民國十三年十四年兩次訂約，正待點裝起運，卒皆因事中止。二十二年教育部復有選印四庫珍本及委託敝館影印之議，經行政院議決通過。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託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敝館簽訂「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合同」，規定將文淵閣四庫未刊珍本縮成小六開本，限期完成。旋經教育部聘請專家組織委員會，編訂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選書二百三十一種，約十一萬一千葉，分裝約二千冊。敝館籌備進行，亦已數月。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開始發售預約，十餘年來中外學者互相欣告，敝館堅苦經營，再願再起者，至此得以實現。全書版式與四部叢刊及百納本二十四史相同，披覽皮藏，並皆便利，另印樣本備索。

冊數
式
預約期
預約價
辦法

出書期

初集共計二百三十一種，約十一萬一千葉，分裝約二千冊。
六開版本，用江南製毛邊紙，金屬版影印，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次。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至同年四月底止，遠地（地域詳載預約價章內）截至六月底止。
（1）自一月十五日起至二月底止 大洋五百六十元
（2）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底止 大洋五百八十元
（3）自四月一日起至四月底止 大洋五百八十元
（遠地六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八十元
（遠地六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八十元
全集分四次出齊（第一次）二十三年七月底，第二次）二十三年十一月底，第三次）二十四年三月底，第四次）二十四年七月底。

書目及預約簡章載入本樣
承索附郵票一角